

罗素自选文集

〔英〕伯特兰·罗素 著



商务印书馆

罗素自选文集

〔英〕伯特兰·罗素 著

戴玉庆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素自选文集/(英)罗素著;戴玉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ISBN 7-100-04836-2

I. 罗… II. ①罗… ②戴… III. 罗素, B. (1872
~ 1970) - 文集 IV. B561.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180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LUÓSÙ ZÌXUǎN WÉNJÍ

罗素自选文集

[英] 伯特兰·罗素 著

戴玉庆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836-2/B·676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7/8

定价: 17.00 元

目 录

引言	1
自由人的崇拜(选自《神秘主义与逻辑》)	9
神秘主义与逻辑(选自《神秘主义与逻辑》)	21
论国家(选自《人类为何战斗》)	56
论教育(选自《人类为何战斗》)	77
社会主义的科学与艺术(选自《自由之路》)	95
应该创造什么样的世界(选自《自由之路》)	110
论教育之目的(选自《教育与幸福生活》)	131
疑问与问题(选自《中国问题》)	159
中西文化的比较(选自《中国问题》)	169
中国人的性格(选自《中国问题》)	181
造成当前混乱状况的原因是什么?(选自《工业文明 之前景》)	194
道德准则和社会幸福(选自《工业文明之前景》)	210
决定性的政治力量(选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 与理论》)	234
触觉和视觉:地球与天体(选自《相对论入门》)	239
当前的趋势(选自《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	248

词语与意义(选自《心的分析》).....	276
数的定义(选自《数理哲学导论》).....	301

引言

给自己的文选写引言并不是容易的事。如果允许我胡说一句,那么等死后我再来写这样的引言也许就容易多了。只要生命不止就无法对自己盖棺定论,也不可能区分个人在某阶段中的变化和在总体上的变化。可是,我还是要努力阐明为什么我现在的文风会不同于早年。

14岁我初学欧几里德几何时,曾对数学怀有强烈的兴趣,并相信科学才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年轻时的雄心曾使我抱有希望:要当人类的救世主。于是,我就生活在确信天下为公的氛围中。我曾想从研究数学转入研究科学,并且一度过着独处的生活,让幻想包围着自己。这种幻想也许同样使青少年时代的伽利略和笛卡尔备受鼓舞。可结果是,我虽然不乏研究纯数学的才能,却完全缺少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实实在在的才干。更准确地说,在数学领域中,对于那些最抽象的内容我往往领会得最好,比如我对于椭圆形函数就不感到困难,但是我却从未成功地掌握光学。所以,科学只差一点就成了我的本行。

就在这时,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迷上了哲学。这倒不是想在道德和理论上得到一种安逸(哲学通常是如此的),而是想看一看我们是否能拥有一种称得上是知识的东西。15岁那年我在日记中

写道:除了意识可以例外,任何事实似乎都是可疑的。(而现在我却不再认为意识可以例外。)我曾认为,同其他流传下来的一般知识相比,数学更可能具有真实性。然而在 18 岁的时候,我阅读了米勒的《逻辑学》,深为他的轻信所震惊。他的观点在笃信算术学和几何学方面又推进了一步,这加深了我的怀疑。此后,我决定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先要弄清楚是否有确实的依据能证明数学具有真实性。

这项工作产生了重要意义。在 1910 年以前,除了略有中断,我一直从事这一工作。1910 年我和怀特海博士完成了《数学原理》一书。在此书中我尽己所能,力图寻找答案,解决那个早在 20 多年前就开始困扰我的问题。然而,主要的疑问依然存在,没有答案。庆幸的是,这项工作引导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并开拓了一个新的数学分支。

写完《数学原理》后,我感到没有必要再把注意力局限在一项工作上。我已记不清自己多大年龄时不喜欢政治了。早在我还不会阅读时,人们就已向我教授英国宪政史。1896 年我出版的处女作是研究德国社会民主的书。从 1907 年起,我曾投入拯救妇女运动。1902 年,我写了《自由人的崇拜》和另外两篇文章(一篇谈数学,一篇谈历史)。这些作品都表述了相同的观点。如果不爆发世界大战,也许我会继续沉迷在科学和抽象思维之中。在 1914 年之前的若干年中,我日渐不安地关注着欧洲列强的政策。我很难接受各交战国政府对于这场大劫难的公开解释,因为那是一种肤浅的、耸人听闻的说法。令我震惊的是战争头几个月里老百姓的态度。这些普通的男男女女不仅轻信了种种无稽之谈,竟然还在震

动中寻找一种快感。很显然，我过去是生活在愚者的理想王国中了。人性，即便是那些自认为是文明开化的人的人性，也存在阴暗的内里。我对于这一点从不怀疑。我曾认为很安全的文明，其自身也会产生破坏力。它所显示的危害可与摧毁古罗马帝国相比。我过去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陷入危机，相形之下，只有数学中的“无穷小”还算正常。

当大战持续的时候，追求抽象的研究工作对我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同从军入伍的战士一样，我也感到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我认为，无论哪一方打赢都不会解决任何问题。1915年，我撰写了《社会重建原理》——美国人把它叫作《人类为何战斗》。我想既然人们已经日益厌倦战争，那就应该调整兴趣，关注如何建设一个和平的社会。这是我希望。显然，要做到这一点，普通人那种不计后果的冲动和失去理性的欲望，就必须改变。现代精神病学认为，这样的改变并不是极为困难的。但仅靠写给专家看的书当然是无法奏效的。因此，战时的几年中，我努力撰写能让大众读懂的书，尽管我的努力并不成功。战争结束后，我虽然发现又有可能重返纯粹经院式的生活，但我已经不想回去了。我现在感兴趣的问题已不再是1914年以前我曾关注的那些事情。我发现，当我从事研究时，思想已不可能把这个世界关在门外。我并不是想装模作样地表示这样做是一种进步，而只是想把它当作事实记录下来。

战后的游历加强了大战对我的影响。我对西欧和美国很熟悉，但以前从未接触过非西方文化。1920年我到苏俄度过5周，会晤了许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同列宁交谈了一个小时。我

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沿伏尔加河旅行,从涅尔诺格拉德到阿斯拉罕,一路访问了不少村镇。在我看来,布尔什维克的哲学令人深为不快。这倒不是因为它信奉共产主义,而是它具有同西方金融巨头相似的哲学特征。考察俄国时发现的问题尚在心中存疑,我就又到了中国,在那儿住了近一年。在中国我发现了一种与西方相比较少有破坏力的生活方式,它拥有美感,而这样的美感在西方已经根绝了。非工业文明的传统美德要想得以续存,希望似乎渺茫。问题是如何使工业化同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相结合,特别是同艺术、个性自由相结合。目前,还没有任何西方国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也许只有那些彻底消化吸收了工业主义的国家才能首先解决此问题。这是因为,一个社会只有既使用机器,又不崇拜机器,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现代社会同文艺复兴时期相比,或好或坏,其任何不同之处都源于科学的作用。掌握了科学的国家,在战争方面,在商业方面,以及在令人羡慕的其他成功之处上,都堪称是最强盛的民族。当今世界,只要与科学为敌就不会有任何机会再获成功。相继而来的是,我们从中世纪继承的某些东西正迅速地化为乌有。在科学面前,连宗教也不情愿地作出了让步,结果被科学深深地改变,已不再那般顽冥了。毫无疑问,宗教的改良还将会继续。传统的原则正在政治领域中快速消逝,也可能将在经济范畴中消亡。

沉思默想的美德曾经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那里传给了僧侣,又从僧侣传给了当代的学者。可是现在这一美德也变得浮躁起来。人们鼓噪说,任何事物都应该“动起来”,结果使深沉失去了

存在的场所。科学和科学的产物——工业主义在亚洲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尤为突出,其程度超过了欧洲。因为在欧洲,科学是同文艺复兴运动同步出现的,相比之下,亚洲则没有植根于自己土壤的“文艺复兴”,以迎接科学的到来。世界必须无可抗拒地接受科学和工业主义。我们对人类所抱有的希望也必须完全符合这一框架。

与此同时,当我审视自己对于人类美德的概念时,发现这些优秀品质包含的许多特质,如无所畏惧的精神、判断是非的独立性、对于野性束缚的争脱,以及闲散飘逸的文化等等,都同古往今来的贵族相联。毫无疑问,是人类早期的生存环境决定了这种联系。那么,在工业化社会中,这些品质还有可能保存和发扬光大吗?有可能使这些美德免受工业贵族的缺点影响吗?缺乏同情心、傲慢气盛,以及对圈外人的冷酷等等,对于这类典型的贵族恶劣品性,社会是不应让它存在的。社会需要的是让贵族的优秀品质成为公德。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经济的保障和闲暇的时间。贵族的优点无不源于这两大要素。从技术上看,这是最终有可能做到的。通过改善机器设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创造一个社会,使每个男女都有可靠的经济保障和足够的空余时间——之所以讲“足够的空余时间”,是因为彻底的闲散既无必要,也不是人们所希望的。

虽然技术上有这种可能,但在政治和心理上却有极大的障碍。新型的社会必须保证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劳动产品更加平均的分配;第二,防止大规模的战争;第三,静止不变或近于不变的人口。只要这些条件不能得到保障,工业主义就会一味增加富人的财富,

扩张强国的领土,并使人口众多的国家再添人丁,而这些对人类都是毫无益处的。自从大战爆发以来,特别是我访问了俄国和中国以后,对于以上三个条件的思考,促使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作品和演讲。

归根到底,是心理原因妨碍着我们更好地发挥新能力去改造自然。因为政治障碍也源于心理因素。在能为每个人提供经济保障和闲暇时间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会比目前这个地球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生活得更幸福。那么,为什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联合起来去战胜百分之一拥有特权者的抵抗呢?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麻木迟钝,部分原因是他们受到厌恶、恐惧和嫉妒的支配,而分心旁顾。人类非但不联合起来创造集体的幸福,相反却竞相制造集体的不幸。芸芸众生之间的争斗有利于统治者,于是他们就以“爱国主义”为名,利用学校和新闻界,鼓动老百姓你争我夺。结果,人性中的劣根性被有意强化了。本来,只有通过团结而不是争斗才能走上幸福之路,但是种种人为的障碍,却使人们认识不清这一点。

彻底改革教育是创造美好世界的重要前期准备。没有这个准备,就算能创造幸福的世界,其自身也会迅速沦为悲惨世界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想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国的痛苦之上。为富家子弟办的学校,强迫学生接受军训,相反却采取一切措施不让学生了解性问题,以保证他们对此事佯装不知。这就是说,一切关于创造生命的事都被贬为讨厌之事,而一切关于夺取生命的事都被捧为高尚之举。这是自杀性的行为准则。这源于一个事实,即我们对权力倍加推崇,而对于生命的丰富内涵却漠然视之。我们认为,能

招致他人痛苦的人是优秀者，而能自我赢得幸福的人并不优秀。因此，我们最需要做的事就是为人类提供一个正确的概念：人类的幸福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

传统的道德家在规劝人们做出自我牺牲时犯了错误。这里有多种原因。首先，几乎没有谁愿意遵循这种规劝；其次，它导致了伪善和自欺欺人，好比你先说服自己希望得到甲，而实际上你却希望得到乙，然后你想，既然我已放弃了甲，也就是做到了自我牺牲；第三，极少数真正做出牺牲的人变得自我感觉良好起来，而且还带着醋意，他们觉得，那些不能做出自我牺牲的人只配遭遇不幸。所以，道德规范不应建立在自我牺牲的基础上，而应当依据健全的心理。自己吃饱了饭得到的快感大于看着乞丐挨饿时所得到的快感。这可能是让人听着不太舒服的格言，但我们只要按此行事，全世界就将停止战争和压迫。因为战争和压迫不仅给战败者、受压迫者带来不幸，同样也使胜利者、压迫者的幸福受到损失。这是一个规律。战争和压迫使弱小一方日见贫穷，因而制造了不幸，但是无论如何它也使强大的一方产生了担心复仇的恐惧。

合理地追求个人幸福一旦成为普遍行为，就足以再造世界。但是，合理的动机并不能单独证实自身具有充分的力量，还需要博爱、慷慨、乐于创造等情感共同发挥作用。政治、经济、心理、教育都起着各自的作用，并且彼此相互影响。不靠其他因素的辅助，只靠其中某一因素，就不能推动社会取得巨大而稳定的进步。所以，研究面过窄就无法创立对我们这个时代有用的哲学。必须兼容所有的生活领域和所有的科学学科——欧洲、亚洲、美洲，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等。这项任务几乎是人力所不可及的。笔者力图

所做的是,提醒人们意识这个问题,自觉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伯特兰·罗素

1927 年于伦敦

自由人的崇拜

(选自《神秘主义与逻辑》)

在浮士德的书房，梅菲斯特讲起上帝创世的历史。他说：

“天使唱诗班无休止的赞美之声渐渐露出烦倦。上帝想，难道自己竟然不值得他们赞美吗？他不是已把无穷的欢乐赐予他们了吗？无功受到赞美，惩治他人反受到被惩治者的崇拜，这难道不更令人欢娱吗？上帝暗笑。于是，他决定导演一幕伟剧。

“炽热的星云在太空中盲目翻卷，经历了难以数计的漫长岁月，终于初始成形：星云的内核裂散出行星群，行星群逐渐冷却，沸腾的海洋和炎烈的山脉颠动摇撼，广袤的黑云浇下如织的热雨，在苍茫的地块上泛滥。此刻，幽邃的大海深处，最早的生命体出世了。温暖的气候正适于繁殖，初始的物种迅速成长为莽莽丛林，巨大的羊齿类植物从潮湿的泥淖中破土而出，大海中的怪兽孕育长大，争凶斗狠，相互吞噬，消亡而逝。随着上帝的剧幕渐次拉开，继海怪之后，人诞生了。他生来就有思考的能力、分辨善恶的悟性，以及对于崇拜的极度渴望。在这个疯狂、怪诞的世界上，人看到的是万物匆匆而过，无一不在死神无可抗拒的召唤前，争相抢取短暂的有生之年，即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于是人说：‘世间有一种潜在的目的性，只要我们能够领悟它，那目的性就具有益处。

为人必当有所崇拜,但在可见的世界上却没有可敬之物。’人旁观万物争斗,确信上帝寄希望于人的努力把这场混乱归化得和谐统一。但食肉兽乃是人类的先祖,上帝把兽类的本能移植给人,被兽性驱使乃是所谓的‘原罪’,所以人企求上帝的宽恕。除非人制定出神圣的计划,平息上帝的愤怒,否则,上帝能否施以公正的宽恕就总令人怀疑。看到目前的景况不佳,人宁愿受更深重的困苦,为的是美好的未来。他感谢上帝赐予自己力量,有了它,虽荣华可及,人却不取。于是,上帝微笑了。看到人在自我控制和崇拜上已日臻完美,上帝遂投送另一太阳横空而过,撞毁人既有的太阳。所有的一切又重新变作星云。

“上帝低声自语:‘是啊,这真是一出好戏,我还要它重演。’”

(与上帝创世相比)按照科学教我们相信的解释,概而言之,这个世界则更无目的,更无意义。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理想和追求今后必须寻找归宿,而无论归宿是在何处。这是因为,人是某种动机的产物,而这种动机又不能预见自身所要达到的目的;人的起源,人的生长,人的希望与恐惧,人的爱心与信仰都不过产生于原子偶然的排列组合;火一样的热情,英雄主义,深邃的思想和强烈的情感都不能使生命免于行将就木;今昔的一切努力,所有的信仰,所有的灵感,所有如日中天的人类天才都注定要随着太阳系的彻底毁灭而消亡,进而言之,博纳了人类所有成就的圣殿也必将无可避免地埋葬在毁灭后的宇宙尘埃之下。所有这些即便不是无可争议,但也近乎确定无疑,以致任何想否定它的哲学都难以有立足的希望。只有采用由上述真理组成的脚手架,只有立于彻底不抱幻想的坚实地基上,人类才可能为灵魂日后的归宿安全地构筑大

厦。

在如此怪异无情的世界中,像人这般渺小的生物怎样才能不泯灭自身的进取精神呢?万能却又盲目的自然界,在宇宙的深渊中急步匆匆,周而复始,不停转动。神秘难测的是,自然界最终竟孕育了一个孩童。这孩子虽然仍服从大地母亲的力量,但他生来就具慧眼,悟性可以辨善恶,判断能够明是非,甚至能评判他那不会思想的母亲的所作所为。死亡不过是家长控制力的标志,除此之外,人依旧是自由的。生命虽然短暂,人却可以自由地审视,自由地批评,自由地求知,自由地发挥创造性的想像力。在他熟悉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人享有自由。不可抗拒的力量统治着人的外部世界,但人却比外力更强大,因为他拥有自由。

未开化的野蛮人同我们一样,在自然界的威力面前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压抑。但是在野蛮人的内心中却没有比得上权力更令他崇敬。他宁愿在众神之前匍匐拜倒,而不反躬自问:他们是否值得顶礼膜拜。悲惨而又令人恐怖的是,为了安抚多疑善妒的众神,人类经受了多么漫长的残忍痛苦的历史和长时间的自我贬低、自我牺牲。战栗的祈祷者心想:当他把最珍贵的东西无条件地献出来时,众神嗜血的欲望就会得到满足,他们也就不会再向人提出更多的要求了。莫洛克教——类似这种用人命奉鬼神的信仰都可泛称为此教——反映了奴仆的怯懦与屈从。身为贱奴,他甚至不敢在心中存有一念,即他的主子是不值得奉承的。由于独立的理念不被认可,权力就受到无约束的崇拜;它迎来了无限的敬意,而不论自身是如何肆虐,招致了他人多少苦痛。

随着伦理道德的勇气渐增,人们逐渐感到需要一个理想的世

界。如果不停止崇拜,那么崇拜也只能献给另一类神祇,而不能给予野蛮人创立的那些众神。但有些人虽然也感到需要理想世界,却有意识裹足不前,依然极力主张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才值得崇拜。这种态度反映在上帝拯救约布出苦海时的谆谆教诲中。他说:上天的威力和神意显而易见,但上天的善心却无半点显示。^①我们当今的有些人也持有这种态度。他们把道德规范建立在“物竞天择”的基础上,认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但是其他人则不满意这种在道德意义上如此可憎的说法。他们乐于采取另外一种立场,即认为现实世界会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同理想世界暗合。这一观点已逐渐被我们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宗教。如此看来,是人类创造了全能至善的上帝。上帝乃是现实与理想的神秘结合体。

然而,现实世界在总体上并不那么美妙。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奴性,因此当我们对现实世界作出判断时,必须从思想中清除奴性。在一切事物中重要的是提高人的尊严,最大限度地把人从无人性的权力统治下解放出来。当我们认识到权力具有危害,而能够分辨善恶的人不过是不辨善恶的世界中的一粒渺小的原子时,我们就又将面临选择:我们应当崇拜力量呢,还是应当崇拜善良?我们的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吗,是一种邪恶吗,抑或只应当把上帝看作是良心的创造物?

回答这些问题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并将对我们全部的伦理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崇拜力量——如我们熟知的卡莱尔、尼采、军国主义信条——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无法在反抗敌意的宇宙时保持理想的操守,乃至一败涂地的结果。正因为失败,我们才匍匐臣服于邪恶,并把我们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作为祭品献给莫洛克教。如